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黄俊杰编

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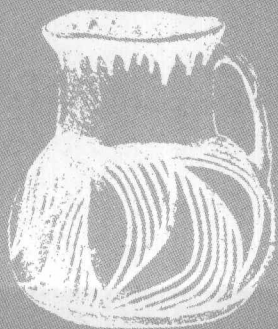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黄俊杰 编

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黄俊杰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1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5709-3

I. 中… II. 黄… III. ①儒家②四书-注释 IV. B222.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944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上下)》, 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137 号

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

编 者 黄俊杰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毛文鳌
责任校对 邵 冰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9.75
字 数 43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09-3/B·357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黄俊杰，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博士，曾任新加坡儒家伦理小组顾问，美国华盛顿大学、马利兰大学、Rutgers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东吴大学东吴通识讲座教授、台湾通识教育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2005起）。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总主持人、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获得学术荣誉包括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奖（1988）、杰出人才讲座（1997-2002）、胡适纪念讲座（2005-2006）、台湾大学学术研究杰出专书奖（2006）、中山学术著作奖（2006）。

著有：《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2007）、《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2006）、*Taiwan in Transformation*（1895-2005）（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6）、*Mencian Hermeneutics: 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s in China*（2001）、《孟子》（1993）、《孟学思想史论》（卷一）（1991）、（卷二）（1997）等书。

个人首页：

<http://huang.cc.ntu.edu.tw>。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 01.《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
- 02.《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通论篇》
- 03.《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儒学篇》
- 04.《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三):文学与道家经典篇》
- 05.《日本汉学研究初探》
- 06.《易图象与易诠释》
- 07.《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
- 08.《孔子的乐论》
- 09.《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
- 10.《儒家经典诠释方法》
- 11.《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
- 12.《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
- 13.《日本德川时代古学派之王道政治论: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中心》
- 14.《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政治法制篇》
- 15.《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
- 16.《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
- 17.《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一体”的立场看》
- 18.《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19.《近代日本汉学的“关键词”研究:儒学及相关观念的嬗变》
- 20.《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
- 21.《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
- 22.《东亚视域中的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
- 23.《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
- 24.《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
- 25.《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
- 26.《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思想文化篇》
- 27.《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文学篇》
- 28.《儒家美学与经典诠释》
- 29.《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
- 30.《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
- 31.《韩国江华阳明学研究论集》
- 32.《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两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为“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黄俊傑 谨识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导 言

黄俊杰

这部书所收录的十九篇论文，都是台湾大学《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所主办的历次学术研讨会中，研究计划主持人以外之学者所发表论述中国与日本儒者的《四书》诠释的论文。除了前三篇论文探讨经典诠释相关的理论问题之外，其余十六篇都讨论中国与日本思想家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的诠释，现在编为专书出版，我想就各篇论文的要旨及其所涉及的问题略加说明，以作为读者阅读的参考。

本书论文共辑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探索》收录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经典诠释的理论问题。第一篇论文作者洪汉鼎是研究诠释学的著名学者，曾翻译高达美（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①，他在这篇题为《诠释学与修辞学》的论文中，循高达美的思路，指出诠释学与修辞学都重视实践性，因为诠释学与修辞学都不是一种逻辑理论，而是一种实践能力。洪汉鼎指出：哲学诠释学揭示真理的原始经验，这种原始经验常常被生活世界中的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所掩盖。第二篇论文是张鼎国的《诠释、修辞与论辩沟

① 洪汉鼎：《真理与方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1卷；（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2卷。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通》。张鼎国在本文中所探讨的是当代语言学转向之后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哲学课题。他首先检讨当前哲学思考上语用侧面大幅度提升之后,传统对语言活动各个面向的看法所出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以后哲学论述的方向和性格。接着,John B. Henderson 在第三篇论文中,探讨“经典的周延性”与“异端的偏颇性”之相关问题。Henderson 曾有专书讨论中国宋明理学、伊斯兰教、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中“正统”与“异端”的建构之相关问题^①。最近也与我合编讨论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时间概念之专书^②。这篇论文主旨在于指出,在许多不同的宗教或思想传统中,经典都被认为内容周延而完整,包括所有的真理、价值甚至一般知识,他称这种现象为“经典的周延性”。他这篇论文就是针对何以诸多不同的传统都有这种“经典的周延性”的共识,提出他的解释。

二

本书第二部分《〈论语〉与〈孟子〉的诠释》收录的五篇论文,都讨论不同时代的中日学者对于《论语》与《孟子》的解释。《论语》一书在中国之地位自不待言,东传日本之后十七世纪日本儒者伊藤仁斋(维桢,1627-1705)誉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③,更成为近三百年来日本各界人士必读之经典,影响深远。本书第四篇论文是台大中文系蔡振丰的《何晏〈论语集解〉的思想特色及其定位》。蔡振丰对魏晋思潮颇有研究,曾以《王弼的言意理论与玄

① John B. Henderson,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Neo-Confucian, Islamic,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② Chun-chieh Huang and John B. Henderson eds., *Notions of 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Forthcoming).

③ 伊藤仁斋:《论语古义》,收入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诠释全书》(东京:凤出版,1973年),第3卷,“论语部一·总论”,页4。亦见于伊藤仁斋:《童子问》,收入家永三郎等校注:《近世思想家文集》(东京:岩波书局,1966年,1981年),卷上,第5章,页204。龟井朝阳(1773-1836)更说:“人之跻《孟子》配《论语》者,未知仲尼之为宇宙一人者也”。参看龟井朝阳:《家学小言》,收入《日本儒林丛书》(东京:凤出版株式会社,1978年)第6册,页1。

学方法》为题,撰写硕士论文。^①他在本文中首先指出如果仅从“始有玄言”的角度看《论语集解》,将无法掌握《论语集解》的特色及其影响。他指出:从“以人合天”的思想而言,何晏(公元? - 249)《集解》并不掺入老庄思想。就《论语》一书的诠释而言,由郑玄(公元 127 - 200)、何晏到王弼(公元 226 - 249),他们诠释的差异建立在对“天道”的不同理解之上,在“以人合天”的架构下,也由宇宙论式思考逐渐趋向于形上学的思考。

蔡振丰分析从何晏《论语集解》到王弼《论语释疑》的思想发展,他认为:从儒学的角度而言,何晏《集解》虽不能对德性根源问题提出说解,但大抵仍保有儒者对德性问题的重视。王弼《释疑》则呈现为形上学的思考,完全扬弃宇宙论中心的思维模式,而将重点放在形上之“无”的把握上,这种思考使儒学的内涵完全失却。蔡振丰的说法与 Rudolf G. Wagner 可以互相发明。Wagner 所撰第五篇论文,主旨在于分析王弼对《论语》的解释。Wagner 是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任教于海德堡大学,撰有专书讨论王弼对《老子》的解释。^② 本文是他有关王弼思想研究的延续。Wagner 在本文中指出,王弼发展出一套脉络化而深奥的解读《论语》的策略。他认为,王弼解释《论语》的关键在于扣紧孔子描述圣人境界时,所显示的对于语言的不信任的态度。王弼从这个角度出发,重建《论语》中的孔子形象,重新解读孔子思想。

《论语》全书胜义纷披,诸多章节触及重大哲学命题,其所引发之辩论或诠释之发展,在东亚儒学史上深具意义,例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章、《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章、《论语·为政》“攻乎异端”章、《论语·里仁》“朝闻道”章、《论语·里仁》“一以贯之”章、《论语·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章、《论语·泰伯》“兴于诗”章、《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章、《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章、《论语·子路》“直躬者”章、《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章等章,在东亚《论语》诠释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的地位,中、日、韩各地儒者对上述《论语》各章的解释及其变化,常常可以显示解释

① 1993 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② Rudolf G. Wagner, *The Craft of a Chinese Commentator: Wang Bi on the Laozi*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者的思想倾向与时代思想气候的变化。本书第六篇论文是张崑将的《朱子对〈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诠释及其争议》。张崑将曾研究德川日本思想史上的“忠”与“孝”的概念,并撰成专书出版。^①张崑将这篇论文以朱子(晦庵,1130-1200)对《论语》“克己复礼”章的解释作为主轴,分析朱子之后中日儒者批判朱子的解释时所提出的解经原则,并指出后儒的解经方法必然误解朱子对此章的解释,故皆无法进入朱子学的诠释之环,而且在他们企图瓦解朱子诠释典范中的解经原则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经典解释的歧异性。张崑将首先阐释朱子“克己”、“复礼”、“为仁”的三个关键思想内涵,他认为除了从《论语集注》了解此章意涵外,尚须从朱子有关此章之著作来掌握朱子关于此章的整体思想,才不致误解朱子的关键思想。张崑将接着举出中日三位儒者作为批判朱子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清儒戴震(东原,1724-1777)以及日本德川时代古学派儒者荻生徂徕(茂卿,1666-1728)、怀德堂儒者中井履轩(1732-1817)等三位儒者均批判朱子。中日三位儒者均认为朱子解经时,违背了使用语言的原则。

《论语》全书之中,言“仁”者凡五十八章,“仁”字在《论语》共出现105次,“仁”确是孔学之关键。本书第八篇论文白奚的《二程与朱子对“仁”的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一文,就是以孔学中的“仁”作为主轴,探讨二程与朱子对“仁”的解释。白奚从三个角度析论程朱对孔子“仁”学的发展:第一是“以体用言仁”:程朱以体用言仁,通过对“性情”、“动静”、“已发”、“未发”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发孔孟之所未发,将孔孟仁学中潜藏的意义充分地展现出来,而且也使孔孟仁学中某些笼统和模糊的表述更加明晰,并由此澄清很多误读。第二是“以生意言仁”:通过这种创造性的诠释活动,仁的价值被进一步提升,由人之道提升为天之道,成为天地化育万物的内在动力。程颢以生生言仁,赋予自然生命以道德的意义,这个理论方向为程颐所继续。注重发明一个“心”字,是程颐以生意言仁的一个特点。以生生之意言仁,也是

① 张崑将:《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该书原系作者在2002年向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提出的博士论文,原题:《日本德川时代“至孝”与“纯忠”思维的典型》,经修订后以专书形式出版。

朱子论仁的一个重要方面,朱子对此论述极多,其重视程度超过二程。朱子以生意论仁,大体与程伊川相近,也是着眼于宇宙万物和人之心性两个方面。第三是对“心之全德”的论述:程伊川以头与手足的关系喻仁与其他德目之关系,十分形象而又确切地突出了仁的统领诸德的特殊地位,在他看来,仁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只有在与其他诸德的关系中才能显现。朱子并进一步进行具体论证,使之更为明确和丰富。朱子的特殊贡献,在于提出了“全德”这一概念以突出仁的地位。朱子还以“生生之意”加以诠释,还借用气化流行的思想论述“全德”之仁。透过程朱在诠释仁与诸具体德目的关系时,所使用的诸如“兼”、“统”、“贯”、“摄”、“涵”、“载”、“包”、“管属”、“宗”、“元”等字眼,程朱确立“仁”的道德总纲的地位。

《论语》东传日本以后,对日本思想与政治影响甚大,最近三百年来对《论语》提出诠释的日本儒者可谓指不胜屈,其中十九世纪的元田永孚(1819-1891)对明治时代影响甚大。本书第七篇论文作者日本关西大学教授陶德民研究德川儒学与日本汉学,均有专书出版。^① 陶德民这篇论文就以元田永孚的日记和《经筵论语进讲录》为基础,探讨明治时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其对经典阐释所发生的影响。元田永孚是年轻的明治天皇(1852-1912)的儒学教师,自1871年起服务二十年,深受天皇信赖。元田永孚为矫正当时政府的急进西化政策,在1878年前后两年之间,和他在宫中的同僚发动一场“天皇亲政运动”。元田的“论语进讲”于1878年1月至4月之间进行,其目的在于培养天皇“修德政治之根本”。从《进讲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元田永孚以“内圣外王”作为其“君德辅导”的基本目标,以“仁者爱人”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以“国体论”作为宪法钦定的主要依据,以灌输忠孝道德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虽然“天皇亲政运动”未能成功,但天皇在1890年《教育敕语》公布和宪法实施时,终于被神圣化。元田永孚坚持以儒教为国教的思想 and 立场,也在他所参与起草的《教育敕语》中获得部分的实现。

① 陶德民:《懷德堂朱子学の研究》(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4年);《日本汉学思想史论考》(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1999年)。

三

本书第三部分五篇论文都论述中日儒者对《大学》与《中庸》的解释。第九及第十篇论文作者郭晓东,在两篇文章分别讨论《大学》与《中庸》的解释。众所周知,朱子平生瘁其心力于《大学》,他的“格物致知”说就是经由他的《大学》解释而建立。^①郭晓东的第九篇论文的问题意识是:朱子从《大学》中开发并特别加以论证的问题是什么?郭晓东指出:朱子诠释《大学》最根本的一个向度就是《大学》“三纲领”中的“止于至善”。在朱子看来,“至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善”,“小学”的工夫成就的是“善”,使人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人,而“大学”则要人“止于至善”,成为圣人。所谓“止于至善”,既要为人本有的明德推至极致,使人心不受一毫私欲之沾染;又表现应事接物之际体察入微,不仅不受事物千变万化所左右而保持吾心之贞定,而且更能将事物之方方面面无不安排得妥当合理。同时,要“止于至善”,工夫上要求无所不用其极,一节接一节而止于至善。在层层递进的工夫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格物致知,它是“止于至善”最重要的保证,朱子诠释《大学》之所以重视格物工夫,应落实在这一点之上考虑。就此而言,格物的目的不在于博学多

① 近来国外研究朱子与《大学》的论文有:(1) Matthew Arnold Levey, "Chu Hsi Reading the Classics: Reading to Taste the Tao — 'This Is a Pipe,' After All," in Ching-i Tu ed.,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p. 245 - 271. (2) Jonathan R. Herman, "To Know the Sages Better than They Knew Themselves: Chu Hsi's 'Romantic Hermeneutics'," in Ching-i Tu ed.,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pp. 215 - 225. (3) John Berthrong, "Expanding the Tao: Chu Hsi's Commentary on the Ta-hsüeh," in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pp. 3 - 21. (4) Chung-ying Cheng, "The Daxue at Issue: An Exercise of Onto-Hermeneutics (On Interpretation of Interpretations)," in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pp. 23 - 44. (5) Kai-wing Chow, "Between Sanctioned Change and Fabrication: Confucian Canon (*Ta-hsüeh*) and Hermeneutical Systems Since the Sung Times," in Ching-i Tu ed.,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pp. 45 - 67.

闻,而在于实践领域的“止于至善”,单纯以知识论的立场看朱子的格物论恐怕有所偏差,陆象山与王阳明批评“义外”、“支离”等说法也要重新检讨。

郭晓东接着在第十篇论文中,分析朱子对《中庸》之诠释,既受到吕与叔相当程度影响,又对吕氏之说提出严厉之批评。但朱子对吕氏之认同与朱子对吕氏之批评具有不同的特色。整体而言,朱子对吕注《中庸》的认同与所受之影响更多的是在对《中庸》文字的训解注说层面,即“学”(经学)的层面;而朱子对吕氏所不满者,则主要集中于对《中庸》工夫的表述上,即“道”(理学)的层面。尤其“求中”之工夫,乃吕氏在诠释《中庸》时所涉及工夫论时的核心观念,朱子既不能认可吕氏“求中”之工夫说,则对吕氏《中庸》诠释中凡涉及与此相关之工夫者,如以“效验”为“工夫”与“德成反本”等观点,皆有所不满。

朱子之注《中庸》,乃博采众家之长以铸成一己之新说,所以,朱子《中庸章句》既有得之以程、张诸子者,也有沿袭传统郑玄之旧注者,程门诸子之说,也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吕氏仅为一较为明显之例证而已。然而对于前贤之传注,朱子并非简单袭取,而是将其纳入新的义理系统之中。因此,朱子之注经,就有两个层面的考虑:第一,要做到最大程度上与经典文本保持一致,可视之为是“学”的层面(经学);第二,又要透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建构一个能够安顿人生、指导实践的义理系统,这可以视为“道”的层面(理学)。正是由于有此后一层面的要求,使得宋代的经学形态有异于汉唐经学的传统形态。

郭晓东认为,自北宋程、张以来之学术传统,即要求“学”与“道”有其内在之一致性,对经典文本之章句传注本来就是为了彰显其“道”的意义。因此,首先,朱子之注经,在透显文本背后的义理同时,亦非常重视对文本本身正确的诠释。然而,程、张以来新的诠释视域下之所谓“经学”,并不是单纯对名物度数的考辨,对文本正确的训解意味着正确地解释文本的义理内涵。朱子在经学层面上认同吕氏之说并受其影响者,应作如是理解。其次,在朱子看来,对经典的诠释,包括对文本具体义理的阐释,都不能与其总体上之义理系统相违背。朱子批判吕氏“求中”之说,又批评吕氏对终章的诠释,其

所用心者均在于此。

郭晓东的分析方法是先挑出吕与叔明确影响朱子的说法,再分析朱子对吕氏之说的回应。郭晓东分析在朱子的《中庸章句》中,引用二程七次,引用吕与叔五次,引张载四次,引游酢一次,引郑玄四次,引杨时一次,引侯师圣一次,引沈括一次。郭晓东也指出,朱子大段抄录吕说论证己说者共四条,他也指出《朱子语类》与《中庸或问》诠释《中庸》时常采用二程与吕与叔之说。郭晓东的研究方法,近似日本前辈学者大槻信良的方法。大槻信良从《四书集注章句》引用前贤之说之统计,探讨朱子治学的因袭面与创新面。^① 这种研究方法提供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面向。

第十一篇论文作者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冯达文则分析朱子与王阳明(1472-1529)对《大学》的疏解,企图回答“中国解经传统的特质何在”这个问题。冯达文首先指出,《大学》的解释可能循着两种不同的路径:第一是顺着《大学》已经开出的形式化与知识化的理路,进一步赋予其主要概念与命题以形式与知识的意义;第二是直接契入《大学》所确认的思想信仰,以个人的践行与体验证成这种信仰。前一个解释路向为朱子开拓,后一个解释路向则为王阳明所赞成。冯达文从朱子与阳明的《大学》解释引出一个问题:既然对同一本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且有的解释离文本相距甚远,我们怎样判定不同的解释的有效性呢?冯达文在结论中认为,从《大学》解释这个个案显示:对同一文本在同一时代乃至不同时代的不同解释,所显示的不是解释的混乱,而是经由这种不同解释,而呈现了文本意义的丰富性。

《大学》一书不仅对公元第十世纪以后的中国影响甚大,而且东传日本以后也深获扶桑学者之重视。荻生茂博在本书第十二篇论文《大盐中斋的〈大学〉诠释》一文中研究日本阳明学者大盐中斋(平八郎,1794-1837)解释《大学》的作品《古本大学刮目》。荻生茂博指出:大盐中斋所著《古本大学刮目》这部书,吸纳王阳明以降的《大学》诠释,并继承清初考据学的成就。大盐中斋强烈批判1790年独尊朱子学的“宽政异学之禁”,他对《大学》的解

① 大槻信良:《四書集註章句に現れた朱子の態度》,《日本中国学会報》,第5期,1953年,页80-90。

释与陆稼书的《四书大全》形同水火。大盐中斋以后,日本儒学与明末思想之关系日益深刻。

本书第十三篇论文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辻本雅史所撰的《贝原益轩对〈大学〉的解释》一文。辻本雅史的研究领域是德川时代日本教育史,著述甚丰。^① 辻本雅史在第十三篇论文中,首先指出不能仅从近代教育学之先驱的角度看待贝原益轩(1630-1714)的历史角色,而应该从“知的现场”与“历史的文化空间”的角度检讨贝原益轩学问的涵义。辻本雅史认为,贝原益轩依循朱子的看法,认为《大学》乃初学者入德之门,所以对《大学》这部经典特别重视。贝原益轩的学问来自朱子的后学,可以视为朱子学周边的朱子学者。贝原益轩解释《大学》虽然大致循朱子学之旧轨,但是在继承朱子之中仍有所创新,例如贝原益轩的《大学说》完全未触及朱子《格物补传》,这一点是以显示他对于《补传》已经有所怀疑,乃转而另辟蹊径。^②

四

朱子确实是近七百多年来东亚思想史中居核心地位之人物,阐朱、述朱、诤朱之论著几至不可胜数,即使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书目也已经卷帙浩繁。本书第四部分所收前三篇论文都与朱子学有关。第十四篇论文作者黄勇任教于美国库兹城(Kutztown)大学哲学系。黄勇的《程颐与经典解释》这篇论文的主旨企图论证:程颐(伊川,1033-1107)的儒家本体诠释学可以为当代诠释学开创新境界。黄勇的论旨建立在三项论点之上:第一,当代西方解释学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解释的目标是要发现经典或文本之独立于作者和读者的客观意义呢?还是作者之独立于文本和读者的本意?或者

① 较为重要的专书有:辻本雅史:《近世教育思想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阁出版,1990年);辻本雅史:《“学び”の復権-模倣と習熟-》(东京:角川书店,1999年)。

② 辻本雅史另有专文讨论贝原益轩出版《大学新疏》之相关问题,参看辻本雅史:《貝原益軒と出版メディア-‘大学新疎’編纂と出版の努力-》,收入衣笠安喜编:《近世思想史研究の現在》(京都:思文阁出版,1995年),页87-106。

是读者之独立于作者和文本之前理解？程颐将这三个问题都与“道”联系起来。程颐认为儒家经典乃是“道”的载体，圣人著述经典的本意在于宏道，而读者投射在经典之上的是他们对“道”的前理解。第二，西方诠释学主要关心的是对经典和一般文本的解释。但是，诠释学作为对人类生存的解释，充其量也不过是本体论的一个导言而已，而不是本体论本身，因为本体论所关心的是存在，而不是人类生存。程颐认为诠释学就是名符其实的本体论，因为诠释学的正当问题是“道”，而“道”乃是宇宙万物之根本。第三，西方诠释学所关心的乃是人类之理解，而不是实践问题，这不只是读者对作者和文本的理解而已，而且也包括其对自己的理解，即读者的自我理解。程颐的诠释学则把理解“道”和实践“道”合而为一。黄勇在本文结论中指出：在程颐的诠释学中，经典的本意、圣人的原义和读者的先见，通过“道”而获得统一，因为经以载“道”，圣人作经本欲明“道”，而读者的先见也是对“道”的前理解。

程伊川对朱子影响至为深刻，朱子所编的《近思录》引用北宋诸儒以伊川为数最多，^①朱子撰《孟子集注》引用北宋诸儒中亦以伊川为最多。^②本书第十五篇论文作者潘德荣将朱子与施莱尔马赫(F. E. D. Schleiermacher, 1768 - 1834)加以比较，他指出：朱子将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视为解释经典的第一目标。朱子认为文本的原意只存在于文本之中，从文本之外寻求文本原意实不可取。朱子解释经典的最大用心之处在于为每一个重要的字都定界说。在方法论上，朱子兼顾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论特点。施莱尔马赫同样将文本的原义置于解释的优先地位，他通过语法的分析，并通过语句(部分)与文本(整体)的循环理解以阐明作品的原义。由于文本实际上可以有多种解释，所以朱子认为理解文本的意义只能被视为理解作者原义的基础，读者还需顺着文本的脉络思考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以便能从平易中理解圣

① 陈荣捷统计指出，《近思录》引用伊川达 338 次，远超过引用明道 162 次、张载 110 次及周敦颐 12 次。参考 Wing-tsit Chan, "On Chin-su Lu and Commentaries," in Wing-tsit Chan tr.,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31.

② 《孟子集注》共引用伊川之言 48 次，居北宋诸儒首位。